

# 儒学气质 清书风尚

## ——清代王守锐留存书作形态及其对闽地沿海区域书风影响构成

清代中后期,是书法艺术求变、求新并得到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,尤其在隶书探索方面,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直逼汉隶,具备很高的艺术价值,被称为“清隶体”。本文挖掘地方历史遗墨书作,对清代道光年间福鼎书家王守锐的清隶体书迹形态作个案介绍,并分析形成书风的重要因素,及其对闽地沿海区域书风产生的深刻影响。

□ 冯文喜

### 书体表现形态与特色

王守锐(1810—1865年),字维鲁,原名守钝。清代道光早期,生员王守钝学业成绩优异,通过岁考和科考两试,入选州郡廪生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时任福建学政彭蕴章(1792—1862年)看到王守钝试卷,觉得他具有文才,当即从廪生选为拔贡,并将名字由王守钝册改为王守锐,号为迟云。王守锐例授清代从七品的文官征仕郎,谨遵福建学政教诲,选为福鼎县学教谕,掌教桐山书院,致力于地方教育教学。

王守锐擅长书画,尤其善于写清隶和行草书,是清代后期闽中沿海区域代表性书法家,遗留有他的多件书作。王守锐五言楹联卷轴《甘菊囊为枕,寒梅画作屏》,共10字,字径约15×23厘米,分左右二联,每联各5字,为王守锐隶书墨迹。单联横约25厘米,纵约110厘米。右联于右单列8字款识“旃蒙单阏三月立夏”,左联于左单列5字款识“迟云王守锐”,钐白文缪篆印章一方,6字“守钝改名守锐”。据款识“旃蒙”为十天干的“乙”,“单阏”为十二地支的“卯”,合为“乙卯”,可知此副隶书作于年代,即清代咸丰五年(1855年),至今已170年。此联书体为隶书,用笔老辣,为王守锐晚年清隶之精品,也是目前发现仅存纸本清隶墨迹。

清代书法题壁现象非常普遍,以适应民居、宗庙、庭院等大型建筑需要。王守锐题壁书法以清隶体为主,主要遗作有《水郊民居题壁》,共有三处,其一,在民居大门右首砖泥灰制坊檐,题壁28字“炼治铜华清而明,以之为镜宜文章。延年益寿辟不羊,与天无极乐未央。”壁龛横约120厘米,纵约40厘米,单体字径约8×12厘米。正文隶书纵写10列,单列最多3字,尾列1字,并行书2字“二吟”,及白文缪篆印章3方,分别是引首章4字“非曰能之”、姓名章4字“王守锐印”、字号章2字“迟云”。此题原文出自《汉宜文章镜铭》,引首章篆文则出自《论语》。其二,在民居大门左首砖泥灰制坊檐,题壁28字“驹氏作竟四夷服,多贺国家人民息。风雨时节五穀孰,长保二亲得天力。”整体规格、形制与右题相同,因分化较严重,未能分辨款识和印章。此题原文出自《钦定四库全书》续卷十四《驹氏二镜铭》。以上两处原作都是五句35字,王守锐题作为四句28字。其三,在民居通廊侧门,泥匾题壁2字“兰馨”,字径约15×28厘米。壁匾横约60厘米,纵约35厘米,正文隶书自右往左书写,未发现款识、印章。题壁出自“兰馨桂馥”一词,彰示以香喻德的精神文化内涵。

世传王守锐有《幽兰图》,所作兰花以水墨为主,墨色浓淡虚实结合,体现兰花外柔内刚的特质。此图之左部三分之二处,以正、侧势构有两丛兰草,通过长撇兰叶顾盼连接成图,笔触灵动、清雅,文人意趣深邃,寄托高洁品格。右部三分之一处,王守锐自作诗题跋:“手植从兰四十年,国香越老越堪怜。傍将怪石深深拜,错被人呼作米颠。”以行书纵写3行,每行8—10字,款识4字“康湖山人”,单独成行,下方印章两方,朱文“王守锐印”,白文“原名守钝”。左部下方,另钐朱文一方,3

字“太瘦生”。秦屿位于东海之滨,境内有康湖、麟后、积石三座山,俗呼为“小三山”。王守锐世居秦屿康湖,故自称“康湖山人”。

从以上代表性书作可以看出,王守锐主要工于隶书,兼行草书二体,所作清隶体联墨、题壁展现端正、整饬特点。他的兰石图题跋墨迹,展示了他行书取于二王法帖,并受清人碑派影响,写得劲健、奔放。民国《福鼎县志》人物志载,王守锐“书长草隶,画工兰石”,由此可见不虚。

### 形成书风因素与取法

清代康熙时期,州、县普遍设置书院,福州有鳌峰书院,王守锐祖父王孙恭(1733—1801年),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举人,监理鳌峰书院。王守锐父亲王锡聆(1757—1818年),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举人,与乡贤在秦屿创立龙门书院、见山楼书馆,先后聘请全闽名师游光绎、郑兼才、陈寿琪、谢金奎等儒士来授课讲学。福鼎桐山书院落成于清代乾隆十五年(1750年),福建巡抚潘思渠(1695—1752年)亲手题写匾额“桐山书院”。这些书院不仅在清代地方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,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,对当地的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据《锦城王氏宗谱》世系图载,王守锐出身于书香门第,祖、父辈筑有“蚤闲斋”“兰亭精舍”以诗书、经学传家,并积极带动族中子弟参加科考。王守锐堂兄王代望(1802—1876年),字维述,号璜鸡,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举人,于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署延平府沙县教谕,兼理训导事务,并掌教桐山书院。王守愿(1813—1884年),字维厚,号少虞,与胞兄王守锐同为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拔贡,先后掌教水郊书馆、桐山书院,并任桐山书院山长。王守锐家族三人于道光末期、咸丰年间掌教桐山书院,对儒士非常敬重,倡建苍霞亭,题额2字“宛在”,以奉祀康熙以来学行兼优的八位乡贤。咸丰七年(1857年),福鼎县令张多第亲撰《苍霞亭记》,意在“欲与莆田之夹漈草堂、建阳之考亭书院并传不朽”,并题匾额“儒宗表率”,以式垂范。

到了清代咸同时期,在科举中落选的士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书写方向,他们在书法上不再唯乾嘉时期流行的董赵体是从,开始纷纷转向对钟鼎、碑刻探求,在金石中寻得新的艺术视角。同时,在举子业和书院教育影响下,福建沿海出现许多金石学家、书法家,引领清隶体、清行楷体潮流,并对馆阁体带来冲击。清代中后期,除了书法大家伊秉绶(1754—1815年)形成富有金石味的“伊隶体”对书学影响外,闽中还有郭尚先、吕世宜、庄俊元等书法名家清隶体也取得很高成就,他们有相同书学路径,即从汉碑上重新取法,形成崇汉尊碑的风气。这时期的福建形成浓厚的金石气息书学环境,隶书成就最大并成为主流。福鼎王守锐等书法家,以新书法视角,从中感受同道书法力量,并转化为自身独特的书法风格。

清代中后期,还有金石理论对书法意识和书学方向也存在极大影响,其中金石铭文成为取法的主要范本和书写对象。清代地方

史志学者,还将金石文收录于方志中,成为考证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源,兼具书学性质。嘉庆十一年(1806年),福鼎知事谭抡聘请王守锐父亲王锡聆为分修,协纂《福鼎县志》,辑录“金石文”19条。王守锐清隶体遗作《水郊民居题壁》,其铭文和字法,则出自咸丰三年(1853年)《顺德县志》卷一九“金石略”《汉生文章镜》:“凡汉铸字多省文,如镜作竟,祥作羊之属,今乃从金作错,洵为特出。至无极之无,汉瓦每用无,亦间有用毋者,可以例,此而作电,则出大小篆、八分外矣。”可见王守锐对汉镜铭文的取法,并作了吸收与重组,以篆入隶,保留篆书意味;用字保留“省文”,即“竟”通“镜”,“羊”通“祥”,“无”通“毋”等。清代方志“金石略”,为书学者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清道光以后,王守锐未能在中举上取得更大进展,因此他退求其次,掌教书院、乡塾,转向对书画探索,并在清隶体上取得成就。分析其成因,与王守锐出身书香浓厚望族、省城游学经历,并受同时代书法家影响有很大关系。但更为主要的则是他取法汉隶、汉镜,沉心于金石学,形成独特的清代闽东书家艺术风格。

### 沿海区域影响与举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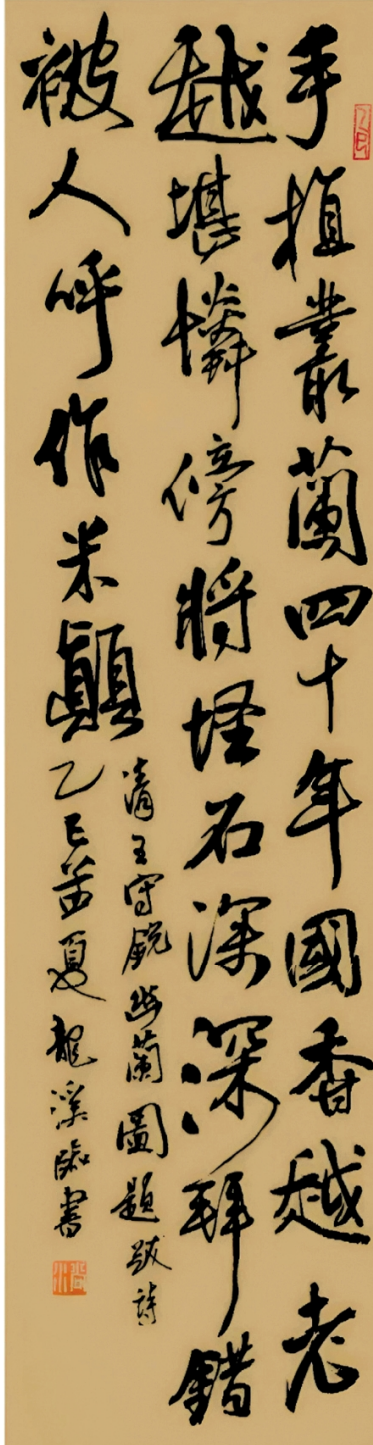
在字法上,王守锐清隶体取小篆路径尤其突出,他的几件遗作中带有“風”“雲”等字,有明显的篆体向隶书转化迹象,如他的“風”隶体书,外围写为“几”,并在左画处加“丿”,内里写为近似“百”。“風”隶体保留“丿”的写法,显然出自《汗简》《说文解字真本》《广金石韵府》等篆书。光绪年间,乡贤林士恭(1852—1911年)在《道由和尚仁寿堂》石刻铭文“卓卓宗风”“道风千古”中,其“风”字隶体,与王守锐写法相同而保留加“丿”。林士恭贡生出身,是晚清时期闽中福鼎书法家,曾学法“扬州八怪之一”的黄慎,取法《汉曹全碑》,所作隶体风美,笔画左右舒展,具有较强的动感。可见同一区域书写者,在字法上会趋向一致而产生同向影响。

王守锐清隶体取法汉碑基础上,融入小篆、八分书笔意,字体端正整饬,笔力雄健至伟,至今仍有风格接近的书写遗作存在,这里例举数方:如乡贤黄锡畴题刻清隶体:“金阙编名注列真,漆镗红里玉鱼新。紫芝留得祥云护,自占青山万古春。”乡贤王圣保题刻清隶体:“远嶂天开锦作屏,满林孟荀长云岫。知君雅爱思皇甫,一卷随身有孝经。”此二题刻所作年代都在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同为石刻清隶体。又如,乡贤高龙光题刻:“大海回澜”“龙盘虎踞、凤翥鸾翔”“人以静而寿,山有仙则灵。”此3方题刻所作年代同是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,为题刻清隶。再如,石刻门联:“民社从今资仓雨,声灵自昔纪扶风。”“家住犀昆悬世泽,功垂麟阁衍宗风。”为清中后期建筑,清隶体,未见题刻作者。

咸丰初年,王守锐在水郊设帐教学,在当地望族中享有声誉,青年才俊都跟从他学举子业。王守锐交游广泛,结识乡都绅士,使得书法得到广泛传播,甚至有人以他的字作为范本来模仿习书。王守锐擅长诗文,有两首诗作颇能反映此时他醉心自然山川、喜游太姥山的经历,一首是《水郊山中送萧吉士、潘

实夫、吴石梅游太姥》:“遥天净耸玉芙蓉,最好秋来理展筇。莫怕峰多不知处,入山认取半空钟。六年鸿爪大纷纷,客梦还多恋白云。寄醉山林一杯酒,休教误勒北山文。”另一首是《同李大占梅、陈二虎臣、林二绉九、画山十三兄晚步伏虎峰》诗:“雨树映斜照,游人开笑颜。相随踏叶去,缓步看云还。暮色沧江外,秋声大壑间。归来谁有得? 萝月满禅关。”

在清代中晚期,王守锐书作被运用于宅第、民居、宗庙等建筑,并通过石刻、泥坊、匾额、楹联、墓屏、碣铭、谱牒等为载体,对后来的书写群体产生广泛影响。甚至运用在建筑上,书迹并能保留至今,衍生如泥线笔画“双钩法”,则是书法非遗的独特技法,闪烁着书家书艺的智慧与光芒。



清代王守锐行书《幽兰图题跋诗》 冯文喜临书(行书)